

绪 论

1928年发端的“30年代文学”有着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它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对‘五四’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五四”产生了自觉的、明显的断裂。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无产阶级的‘五四’。与‘五四’反封建的主题相对照,它提出了崭新的反资本主义的主题。因此,30年代初,“五四”文学革命中意气风发的猛将刘半农在回顾“五四”的时候就不禁慨叹:“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①其次,1928年崛起的“30年代文学”是在国民党的屠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尖锐严峻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中成长起来的。它与时代、民族、人民共着苦难、血腥、挣扎、斗争的命运,它唤醒和组织了人民,并且改变了历史。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②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它解构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最终颠覆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姜穆说:“‘三十年代文学’之所以引起一再的研究,一再的讨论,倒不是‘三十年代文学’是最有

成就,最伟大的一个时期,而是在这个年代里,中共运用了文艺,逃过它危亡的命运,而且改写了历史。’^③因此,我们可以说,“30年代文学”达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最高理想境界;我们可以说,中国30年代文学史是一段血写的辉煌不朽的历史。

上海通社在编辑《上海研究资料》时总结说:“等到我们收拢这记录的累积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推论:(1)有许多不同范畴的事物在同一年份内发现;(2)事物相互间的联系在年份的前后发现,以致发展姿态锐化或钝化。”^④这样从丰富的偶然性之中形成了所谓时代精神,形成了历史的主题和脉络。1928年发生的许多文学事实正是在“30年代文学”的映照之中凸显了其文学史的意义。

1. 暴日侵略下的中国

1928年1月1日,天津《大公报》第3版援引1927年12月27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披露了布哈林在12月9日和10日在共产国际大会对外报告中“攻击日本之对华政策,称日之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之资本主义国中乃最侵略的”的内容。^⑤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开始北伐,日本力图阻挡中国的统一,不断对中国南北政府和军队进行威胁、利诱、挑畔和干涉。1928年5月3日日军悍然制造“济南惨案”,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肆意凌辱,惨无人

道地割去耳鼻舌头，挖去眼睛，然后用机枪扫射。5月9日，日军进攻济南，蒋介石电令北伐军“暂行让步”，退出济南。来不及撤退的军民被日军疯狂屠杀，史称“五九国耻”。军阀孙传芳电称：“南曰讨赤，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南北政府一致对日抗议。张作霖发出息战通电，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日本军队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同日，未来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日军保护下逃离天津。

张学良不顾日本的要求，于1928年12月29日使“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于是，很快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沈阳事变，侵占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中国现代化的心脏上海。据经济学家估计，尽管战事频仍，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仍然高达8.4%，^⑥因此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使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突然中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史，其另一面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面对暴日的不断侵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执行软弱屈辱的“不抵抗政策”，从而使它在现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中丧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政权首先是毁灭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屈膝投降之中。日本的侵犯和战争的全面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然

发展，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抗战文学”的特殊阶段。

2. 国民党统治的失败

1928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开国纪念大会，这是自孙中山民国元年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国民政府第一次能够在南京举行开国纪念大会。中华民国一直是军阀手中一个体弱多灾的少年。周瘦鹃在寓言体小说《十七岁了》中形容说：“可怜他雨打风吹，霜欺雪虐，连过了几年苦痛的生活，先天既已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终年不断的伤风咳嗽，忽冷忽热的发疟病，身体既淘虚了，便益发容易外感，再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面黄肌瘦，弱不胜衣，虽是一个小小孩子，竟好似变做了个痨病鬼。”^①

国民党的光荣历史是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很快打到了长江边上。然而，在北伐途中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清党”的屠杀中，国民党毁灭了它的基层组织，成为了一个与社会基础脱节的利益集团。1927年4月18日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建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历史倒退之上。国民党南京政权是一个依靠其军事力量独立存在的集团，根据外国历史学家的观察，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而服务的”；这个政权，除它自身以外，它不对任何政

治集团或法制负责，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反应也不必听取”。^⑧

蒋介石在政变中建立起政权，然而他很快在 8 月就被迫下野）通过 12 月蒋宋联姻，1928 年 1 月，蒋介石在南京复职。蒋介石不断地下野之后又重新上台，可是却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合法稳固的他理想中的独裁统治。1928 年 3 月 15 日，陈公博在上海《贡献》杂志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为国民党改组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国民党内部对南京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丧失了政治的合法性蜕变成为了新军阀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重蹈北洋军阀混战的覆辙。1929 年 5 月，李宗仁在广东首先举兵对南京政权挑战；10 月，阎锡山、冯玉祥又缔结北方军事集团，1930 年 5 月 13 日爆发了“中原大战”，这充分暴露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性和脆弱性。

国民党没有进行农村土改，与此相反，共产党把土改和暴动深入到农村中去。天津《大公报》1928 年 1 月 3 日以《广东之红恐怖》的标题描述广东“暴动事，蔓延全省，海陆丰杀人如麻”。1 月 5 日，彭湃领导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数万人民群众大会欢迎广州起义部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疯狂盲目地屠杀，1928 年 1 月 1 日，天津《大公报》以《先杀后报》的标题报道赣省政府通令各县严捕共产党，准就地枪决，再行呈报”。《大公报》1 月 6 日报导《湘政府悬赏缉共党》。3 月 19 日，方鼎英在南京各界代表欢迎会上惊呼，广东北江、湘南一带“共产党都猖獗得了不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倘不及早扑灭,将貽患无穷”。

在政治上反动的同时,国民党也实行反动的文化政策,他们拒绝新文化,鼓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对于国民党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连依附国民党反动政权,后来做了“过河卒子”的胡适也痛心疾首地指出:“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他认为:“国民党将来只有渐渐地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他说:“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⑨30年代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豢养的教授们抛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遭到文化界一致的唾弃,说明了国民党文化合法性建设的失败。因此,在30年代,除胡适、丁文江等极少数不甘寂寞和早就与北洋军阀政府不清不白的知识分子之外,整个知识界都是左倾的,至少像周作人、沈从文、施蛰存等人那样保持着明显的距离。

3. 1928 年的上海

1928年的元旦,上海资产阶级正沉醉在30年后的梦想里。在他们的梦里,“天气是清明而温暖,有人说,近年来自巴拿马运河开通以来,常有一股暖流,来温和我们这个东海之滨,所以上海现在地气渐渐转暖了,因

为世界承平了二十年，于是环球一切事业，蓬勃发达。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地大物博，一向许多宝藏，都没有开发，这几年来，进步似飞的一般”。^⑩《申报·自由谈》更是异想天开：有人做了一种贺年片，四周都是青色，当中有一个白圈，姓名写在白圈里面。“这张贺年卡的寓意，就是说他是在青天白日的中间，过安乐的生活。”^⑪这是一个特别富于梦想和需要梦想的时代，30年代年年都重复着新年梦想的快乐。1933年，《东方杂志》收集到160多位知名人士的“新年的梦想”。历史学家周谷城说：“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作什么梦想了。”^⑫

大马路、霓虹灯、电影院、夜总会、跑马场、交易所、舞厅、汽车表征着上海的繁荣，海派文人的笔下的上海是这样像梦一样繁华：

宽阔的街面流泻着金融的气息。

排着整齐的队伍，汽车在街的边沿停下来，等候着主人的 close hour。……

有色的年(霓——引者)虹灯火织成的直线的街。^⑬

1928年，上海人口360万，集中了全国的工业和财富。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蒋介石亲临致词：“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不能有头绪……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⑭

1928年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以后，发生了“迁都问题”和“迁都之争”，国民党定都南京的根本原因在于

它对于上海金钱的依赖和控制。南京国民党政权是在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却以勒索掠夺来回答了资产阶级的支持。1927年4月上海资产阶级帮助蒋介石镇压了共产党，然而蒋介石很快在夏天就用绑架敲诈来回报他们。当1928年1月，蒋介石卷土重来之后，1927年夏天席卷了上海的绑架风潮也重新蔓延开来。国民党向上海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运动场这两个赛马场各勒索50万；1928年1月19日，远东公共运动场董事长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富翁们纷纷离开上海以躲避绑架。杜月笙从社会渣滓变成30年代的社会名流充分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流氓性质。资产阶级成为了流氓政府的无奈的牺牲品和最大的倒霉蛋。他们的希望在1928年再次幻灭了。在南北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空隙之中发展起来的上海资产阶级在1928年这个新政权这里充分显示了它被欺骗抛弃、敲诈勒索的黯淡命运，用外国研究者的话说：“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在上海第一年的统治几乎是一场灾难。……作为中国最有力量的经济集团的上海资产阶级，企图把他们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的打算，已经是落空了。上海资本家在1927年以前十年中所享受的政治自由突然结束，而坠入到‘恐怖统治’之下了。”^⑤

一方面，上海资产阶级是南京政权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上海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现代性的复杂对比与矛盾。1931年设立了上海航空新闻社，能将上海各种报纸于当日寄到沪平、沪汉、沪粤三线通航各埠，于

次日寄到汉渝、渝蓉、西北三线通航各埠。“自从科学进步工业发达以来，整个社会的旋律是按着轮机的搏跃而跳动的。它在文化上的表征是迅速，急切，一致。”^⑧资本主义在全球一体化的拓进中却不能消弭它内在的矛盾，而是将它自己卷入了国际性的冲突之中。1928年4月9日，《申报》本埠新闻栏以《能说英语之犬到沪》报道美国人华那克带他名叫金盘莱的狗来到上海表演。上海从街道等地名以至生活方式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上海畸形的繁荣和整个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⑨最后于1949年，随着共产党军队的进入上海，方始证实上海的影响到达乡村。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上海卷入了现代的矛盾与危机之中。“上海是世界第六位的大都市，是中国第一位的大商埠；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经商的大本营，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滋长的根据地，上海的市民，日益增加，上海的建筑，日趋高大；这都足以表示上海的繁荣与欧化。但在另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市民中，不知有若干人在号饥呼寒；在日趋高大的建筑旁，不知有若干人在风餐露宿。上海的生活更富于变化与对比，有主人，有奴隶；有高等华人，有马路瘪三；有大量之进出口贸易，有大批倒闭之工厂与商店；对此富于变化与对比的上

海生活，各人必可以其职业、家庭、生活、思想之不同，而各有其特殊之感想，或颂国际帝国主义之无疆，或咒民族资本主义之没落，或梦想金元铺路，或杞忧都市陆沉。’^⑮

正是在上海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生了新的无产阶级及其世界观，崭新的无产阶级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1928年1月，随着《太阳月刊》和《文化批判》等杂志的创刊，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创造月刊》1卷8期上《〈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曾经预言：“《文化批判》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⑯成仿吾在《文化批判》创刊号的《祝词》中指出，《文化批判》“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⑰继《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之后，《流沙》、《我们》、《呐喊》、《血潮》、《青海》、《洪荒》等杂志推波助澜，形成了1928年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与突变来。”^⑱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留日的青年知识分子运用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于“五四”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合理化批判，揭露‘五四’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的蒙昧状态，产生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新锐的马克思主义的后

蒙运动。

在重重的矛盾之中，上海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创造历史的能力。30年代资产阶级现代性产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浪子，但是却无法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形象和英雄人物，资产阶级文学已经丧失了叙事能力，成为了一种盲目地追求感觉刺激的破碎零散的新感觉主义。似乎命中注定了，也正如我们在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所看到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叙事才能讲述他们生不逢辰的不幸历史。

1928年的上海包孕了深刻尖锐的矛盾。作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国际性的大都会，上海是现代矛盾的聚积，尖锐的对比和复杂的刺激使它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因而充分地危机化了。《东方杂志》编者胡愈之在1932年元旦发表的《现代的危机》中说：“现世界之矛盾性与复杂性，造成了重大的危机，这危机又因了现世界的连系性而更重大化尖锐化了。在从前各民族相互隔离地生活着，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即使发生了灾祸，也只是地方的局部的灾祸而已。在我们的时代，新式的交通利器，科学的生产工具，超国界的经济组织，把整个世界打成了一片。”“这是一九三二年的初头，我们也仿佛到了梵苏维亚火山爆发的前夜了。紧张，恐怖，忧虑的空气，笼罩了大地，窒息了和平的空气。连那些感觉迟钝的，都预感到了大灾祸之将临，这牵涉全民族全人类的大灾祸之将临。”^②1933年，新中华杂志社以《上海的将来》为题收集到的征文中预言：

尖锐的对照，极端的膨胀，这些都是趋向毁灭的表现。^②

大减价、绑票、暗杀、共产党的标语、法西斯蒂的传单、各帝国主义者的兵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陆战队，这些显示着‘上海的现在’。

从这些推展开，便是‘上海的将来’了。换句话说，上海的将来，只有在各派混战中而告灭亡。^③

这虽不是必呈的现象，至少也得为龟蓍式而科学化的预言：上海繁华的寿命，要在一九三六年——军缩条约失效之日——正寝了。^④

当太平洋怒潮掀起时，即使上海变为一九一四年的瑞士，仍免不了使诗人高咏‘百代豪华付劫灰’了。^⑤

4. “死去了的阿 Q 时代”

革命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方式。1902 年在中国现代化最初的自觉追求中，梁启超便说：“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

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②充满着矛盾和危机的 20 世纪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时代。文学，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革命和反抗的，1928 年，在中国形成了革命文学的鲜明主题。当 1928 年‘革命的浪漫谛克’的文学在上海爆发流行的时候，巴金也在法国完成了《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灭亡》。1928 年至 1930 年，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之中反而出现了革命文学的高潮。胡也频等许多左翼作家就是在这时完成了他们的思想转向的。“30 年代文学’不是有闲阶级和学士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成为了最迫切、最英勇的生命斗争。“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③30 年代作家有时就是职业的革命家，比如柔石、胡也频、殷夫，他们的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艺术，他们的死是为了人类的解放。“30 年代文学’是浴血的文学。1931 年，当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集体屠杀后，鲁迅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中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④“30 年代文学”的天空是广大和崇高的。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作家巴金说：‘固然人说生活是短暂的，艺术是长久的，但我却始终相信着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

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点留恋。^③对于艺术的蔑视和亵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倾向。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视艺术的时代达到了艺术创造的高峰，“30年代文学”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可逾越的最高成就。在30年代产生了茅盾、巴金、老舍、李的人等长篇小说的大家。1933年，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离婚》的出版标志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上的成熟。与此同时，曹禺完成了话剧《雷雨》，使中国现代话剧走向艺术的高峰。从1928年开始，戴望舒开始了对20年代新月诗风的反叛，树立了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典范，从而使象征主义和自由诗在新的艺术高度上重新展开。“30年代文学”培养和产生了张天翼、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萧军、萧红等文学新人，培养和产生了新的文学思维方式。

茅盾曾经在《读〈倪焕之〉》中指出，鲁迅小说“在攻击传统思想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五四’的精神，然而并没有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那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中国的暗陋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陋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呐喊》是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④1928年的革命文学明确地提出了“尖端题材”和“前卫的眼光”的时代性要求，革命文

学自觉地摄取时代漩涡中心的斗争生活。都市成为了“30年代文学”的重要背景，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表现了都市，一种是以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和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所代表的“都市风景线”，丧失了自我和历史意识的迷乱分裂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一种是以茅盾的《子夜》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必然没落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也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了农村。一种是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的以堕落的都市／淳朴的乡村的反现代性编码方式所进行的对于农村的重新阐释与发现；一种是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王统照的《山雨》和叶紫的《丰收》为代表的以‘父与子的冲突’体现出来的新的农民形象和农村觉醒。“30年代文学”所表现的文学世界同“五四”文学所表现的文学世界有了巨大的以至根本的区别。

注 释：

- ①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北平，星云堂，1932。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35页，人民出版社，1980。
- ③姜穆：《左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见《三十年代作家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
- ④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 ⑤《布哈宁之日本对华论》，载天津《大公报》1928年1月1日。
- ⑥见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9页，杨希孟、武莲珍

-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⑦ 周瘦鹃:《十七岁了》,载上海《申报元旦增刊》1928年1月1日。
 - ⑧ 伊斯门:《流产的革命》,引见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320-321页。
 - ⑨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2卷6、7期合刊(1929年9月)。
 - ⑩ 天马:《三十年后之申报》,载《申报元旦增刊》1928年1月1日。
 - ⑪ 黄影呆:《谈谈几种应时的贺年片》,载《申报·自由谈》1928年1月1日。
 - ⑫ 《新年的梦想》,载《东方杂志》30卷1期(1931年1月)。
 - ⑬ 黑婴:《回力线》,载《文艺画报》1卷4期(1935年4月)。
 - ⑭ 1927年7月8日《申报》。
 - ⑮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52-53页。
 - ⑯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381-384页。
 - ⑰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4页,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⑱ 新中华杂志社辑《上海的将来》,上海,中华书局,1934。
 - ⑲ 〈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载《创造月刊》1卷8期(1928年1月)。
 - ⑳ 成仿吾:《祝词》,载《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
 - ㉑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载《语丝》4卷11期(1928年3月)。
 - ㉒ 愈之:《现代的危机》,载《东方杂志》29卷1号(1932年1月)。
 - ㉓ 孙百刚语,见新中华杂志社辑《上海的将来》,3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 ㉔ 管见微语,同上,45页。
 - ㉕ 夏保罗语,同上,30页。

- ②⑥ 郑学稼语,同上,35页。
- ②⑦ 梁启超:《释革》,《饮冰室文集》之九,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 ②⑧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载《拓荒者》1卷3期(1930年3月)。
- ②⑨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载《前哨》1卷1期(1931年4月)。
- ③⑩ 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见《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上海,开明书店,1936。
- ③⑪ 茅盾:《读〈倪焕之〉》,载《文学周报》8卷20号(1929年5月)。